

李萬居與《公論報》

文／陳儀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圖片提供／李萬居精神啟蒙館



▲《公論報》與李萬居。

「半山」李萬居 戰後歸臺試作調人

1945年4月創刊於重慶的《臺灣民聲報》半月刊，即是臺灣革命同盟會的機關報，迄10月為止出滿10期，因戰爭結束「擬轉往臺灣出版」。該刊發行人就是李萬居，主編是連震東。概括而言，這些作者的基本論點相當一致，諸如要求收復後的臺灣應早日實施憲政，政府與人民之間，應以服務和被服務的關係代替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語言文字的改換應採緩進政策，即一方面普及國語，一方面仍須承認臺灣語為暫時（十年或八年）的公用語（official language）；長官公署應該避免省籍歧視，敢用並重用臺灣人。不幸的是，上述的各項建言所擔心的事，果然在戰後臺灣一一發生。

二二八事件發生的原因甚為複雜，可以斷言的是，戰後臺灣的官民衝突、族群衝突是遲早的事。事件爆發點的臺北市，由臺灣人公職所組成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最為動見觀瞻，李萬居名列常務委員且天天開會，最後處委會通過的三十二條改革要求竟成為犯罪的證據、出

兵的藉口。1947年3月30日陳儀以長官公署名義撰寫的「二二八暴動事件」報告，就把處理委員會界定為「逾越常軌，演變而為非法反動之集團，至為明顯」、「即為一般奸黨及少數野心家所操縱」，難怪李萬居在事件中亦差一點被軍警逮捕，幸經《新生報》的員工及時發現，緊急通報長官公署，才被公署的憲兵解圍。

依照李南輝（李萬居長子）的回憶，軍隊登陸以後有很多學生及有領導能力的人被逮捕，「我父親曾為了這件事去奔走。當時主事者說這批人是暴民，我父親就說『臺灣人也是人』，希望能公平的處理」。然而在那族群衝突氣氛濃烈的時刻，具有「半山」身分、想要強作調人的李萬居，畢竟無法得到一些較激進的臺灣人的諒解，因而不久就發生李萬居在上海被一群臺灣人圍毆的事件。

從《臺灣新生報》到《公論報》：走上反抗的道路

辦報是李萬居的「理想和興趣」，所以當1947年9月作為省營事業的《臺灣新生報》改組，李萬居由社長被改任董事長，「權力被架空」以後，緊接著他所籌辦的民營報紙《公論報》就在同年10月創刊，直到1961年3月因政治因素被迫休刊、易手為止，李萬居以十三年的心血見證了白色恐怖的年代，並且以這份媒體作為他對臺灣社會的服務和犧牲。1957年當《公論報》創刊十周年時，李萬居在親自撰寫的社論中說到：

「臺灣五十年間在日本帝國主義的殘酷統治之下，我們的先人以至我們不斷地奮鬥，犧牲無數生命，以求者，也不外是在日本人壓迫統治被推翻之後，才有實現可能的民主與自由；不只是不甘受異族統治而已。」

所謂「不只是不甘受異族統治而已」，換個方式說，就是我們追求的不只是民族主義的價值，同時要追求民主主義的價值；如果臺灣在國府統治之下不民主不自由，那麼「我們」該當如何？答案很清楚，就是繼續反抗。

政治人物辦報，除了所謂言論自由、表達自由的理想層面外，現實上也可以拓展自己的政治空間。例如1960年夏天「中國民主黨」積極籌組的階段，《公論報》就發揮相當的動員功能。當局亦深知此理，在處理雷震案前，即以各種方式打壓《公論報》，包括創辦人之一的陳其昌、總主筆倪師壇、副總編輯李福祥、編輯阮景壽，乃至各地許多記者紛紛入獄，罪名無奇不有；其他打壓方式還有禁止機關學校訂閱等。在1960年9月蔣介石親自主持逮捕雷震之後的內部檢討會上，蔣氏除了了解逮捕及偵訊過程外，就問「李萬居如何？」「高玉樹如何？」屬下鄭彥棻的回答，即提到「李萬居涉嫌背信欺詐（按指《公論報》改組糾紛）已由法院處理中」。

國民黨在臺灣的威權體制，一方面長期凍結中央民代的改選，另一方面卻早就開放地方（省級以下的）選舉。在不自由、不公平的競爭條件下，李萬居卻屢選屢中，總是得到四、五萬票的支持，充分顯示李萬居作為政治人物成功的一面，以及臺灣社會蟄伏的潛力。李萬居的省議員身分，不但使他能夠為故鄉沿海鄉鎮爭取興建堤防和大排水溝等預算服務選民，更使他有機會

在議壇上縱論國家大事、批評時政。

在組黨運動中，一方面有《自由中國》雜誌的雷震等外省籍知識分子，一方面有李萬居、高玉樹等本省籍政治人物，互相為用，給予國民黨相當大壓力。蔣介石除逮捕雷震等四位《自由中國》相關人士外，就是以司法手段、特務干擾對付李萬居和高玉樹，甚至在雷震案發生一年之後，當局還針對李萬居在雲林的極重要支持者即縣議員蘇東啟，羅織臺獨叛亂的罪名而大肆逮捕，李萬居除在省議會質詢批評為「勉強和過火」，為此發出不平之鳴，也只能徒呼奈何。

結語

若要進一步討論李萬居的政治思想，除從個人的生平、性格出發，還應注意戒嚴體制下的臺灣背景。雖然臺籍政治人物在省議會曾有所謂「五龍一鳳」或「五虎將」的美稱，組黨運動中也全島串連出七、八十位民主人士準備設立「中國地方自治研究會」，但臨到最關鍵的組黨時刻，還是有不少人以各種因素抽腿，堅持到底的畢竟不多，李萬居就是難得的少數之一。

李萬居的思想資源之中的確有不少中國材料，他在詩文中所欣賞的鄭成功、石達開都是有種族之感的英雄人物；對李萬居而言，中日戰爭結束前的民族立場是無可置疑的，二二八事件後，碰到「臺灣與中國」的衝突就尷尬了，那畢竟不是談論臺灣民族主義的年代，李萬居選擇辦報、議政、組黨等民主的反抗方式，可謂智慧的選擇，後人稱他為「臺灣民主自由的先行者」、「民主英雄」，應當之無愧。☞



▲公論報報導《自由中國》被迫停刊。